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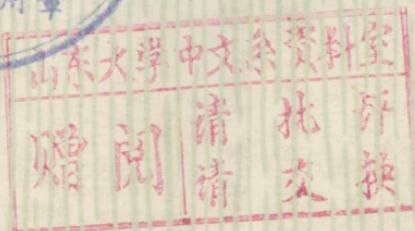
74—964



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

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图书资料专用章



学习魯迅的革命精神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征求意见稿)



山东大学
曲阜师范学院 中文系鲁迅学习小组

毛 主 席 語 彙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 主 席 語 彙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讀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反孔斗争的光辉战斗历程	1
第二章 戳穿孔丘的反动面目	14
第三章 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	25
第一节 “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倒退	25
第二节 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	39
第三节 “仁义道德”是反革命专政的遮羞布	49
第四节 “中庸之道”就是反革命之道	58
第四章 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尊孔阴谋	75
第五章 学习鲁迅反孔斗争经验，发扬鲁迅 反孔斗争精神	95

勇人國中，不尋講戀思浓着手，义主國昌，同僚亟四五
士会將革命義主主身譯武丸，即得萬个一工人誓半其靈譯
崇聯半公公領印个各會請齊梁丘書。合照如證要重革命義
武，將並古良并尊譯由合紙印出誠典靜留不享。表丑半公

第一章 魯迅反孔斗争的光輝

战斗历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对鲁迅一生最正确、最中肯的评价。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他光辉的一生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战斗，对孔孟之道及其鼓吹者所作的无数次的你死我活的较量，是他辉煌战斗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早在青年时期，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了反对腐朽的清朝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活动，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封建专制的统治，批判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在一九〇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就抨击了复古派、改良派和洋务派，指出一味夸耀“古文明”的，必“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使中国进入黑暗的“长夜”；幻想复古倒退的，必然“无希望”。

鲁迅顽强、勇猛地投入反孔战斗，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五四运动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孔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紧密配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任务，毫不留情地痛击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逆流，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五四运动前后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但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北洋军阀政府。但他野心不足，更图谋复辟帝制。于是勾结封建顽固势力，掀起尊孔复古的妖风恶浪，利用孔丘作复辟的工具。他迫不及待地发布“尊崇孔圣”通令；炮制尊孔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演出“尊孔祀圣”大典，亲率百官三拜九叩。与此同时，保皇党头子康有为，封建余孽陈焕章之流，纷纷打出旗号，组织孔教社团，出版孔教杂志，叫嚷“保存国粹”、“发扬国性”、卖力地充当复辟帝制的吹鼓手。在尊孔复古的紧锣密鼓声中，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登上“皇位”，次年改为“洪宪”元年。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垮了台，不久，一命呜呼。一九一七年六月，康有为再次伙同封建军阀张勋，在一片尊孔的喧嚣声中，扶植被打倒的清帝溥仪重登皇位。但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这出丑剧只演了十二天，就草草收场。

辛亥革命后思想领域里出现的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是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大搞复辟的舆论准备，也是他们妄图拖着历

史车轮倒转的垂死挣扎，是对于辛亥革命的疯狂反扑。

但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住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一九年，我国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开展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而且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道德、旧文化，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顽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四”时期就战斗在“打倒孔家店”的最前列。毛主席在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以马列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深刻揭露了孔孟之道是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思想，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人民要摆脱压迫和奴役，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孔孟之道的束缚。毛主席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代表了“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革命方向指引之下，参加反孔战斗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当时鲁迅虽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从这个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中，敏锐地看出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眼前”“闪出”的“曙光”（《坟·我之节烈观》）。在十月革命鼓舞下，在中国革命先进分子

的激励下，鲁迅摆脱了曾经由于辛亥革命失败而产生的暂时的苦闷情绪，从“五四”前夕，就积极投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拖着中国倒退的尊孔复古逆流，坚决给以回击。

一九一八年，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孟之道的本质就是“吃人”！接着，又写了《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小说，多方面地剖析了“吃人”的现实，号召人们“清醒”和“惊起”，去“毁坏”孔孟之道统治下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精神上的“铁屋子”（《呐喊·自序》）。鲁迅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现在的屠杀者》等许多杂文，对于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孔孟之道痛加撻伐，“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两地书》）。鲁迅指出封建旧道德、旧文明、“国粹”等等，是“退婴的病根”，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工具。鲁迅的这些批判，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起了重要战斗作用，它粉碎了封建势力借孔孟之道复辟的阴谋，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为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开拓了道路，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一九二四年一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直接威胁到北洋军阀的统治，他们便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发动疯狂反扑。在五四运动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除动用反革命武力，制造了一系列血腥镇压事件外，还网罗一批反动文人，掀起一股股尊孔读经逆流，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向新文化运动进攻。

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北洋军阀头子们，也都是尊孔崇儒的小丑。他们狂叫“孔子圣德”（吴佩孚：《明德讲义》），胡说“孔子少正卯之诛”，表现了“治国”“纲纪”（段祺瑞：

《二感篇·内感集》），以孔丘杀害革新者的暴行，为自己的血腥镇压辩护。帝国主义分子，也俨然以孔孟信徒的姿态出现。日本反动文化团体斯文会，极力颂扬“孔子之道，至大至高”；统治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年年“恭祝圣诞”，表演尊孔丑剧。

配合中外反动派的尊孔叫嚣，一些反动文人也纷纷登台亮相。曾经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在五四运动期间，就从新文化阵营内部破坏反孔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尊孔的反动面目。一九二三年前后，他大肆鼓吹“整理国故”，并向青年推荐多达二百种、共一千余册的所谓“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其中包括大量儒学书目，企图引导青年逃避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躲进研究室，埋头于孔孟之道的故纸堆中。此外，如一九二二年出现的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旗号的“学衡派”，一九二五年出现的鼓吹“尊孔读经”的“甲寅派”，等等，也都极力煽动尊孔复古，宣扬封建思想，反对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费厄泼赖”精神，贩卖“调和”、“仁恕”等黑货，就是妄图以孔孟的中庸之道瓦解群众的革命斗志，维护北洋军阀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在尊孔这面黑旗下，麇集了中外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他们捧出孔老二的亡灵，扯起孔孟之

道的破旗，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住他们即将失去的“天堂”，抗拒时代的洪流，阻止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这又一次表明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人民群众，对这时期的尊孔复古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毛主席发表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批判了压迫中国人民数千年之久的孔孟之道，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主席发出“打翻这个封建势力”的伟大号召，并热情歌颂农民群众起来打倒这些封建教条，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曾经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无情鞭撻了孔孟之道的鲁迅，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在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和鼓舞下，更加斗志昂扬，继续向新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开战，写下了大量锋利无比的讨孔檄文。

针对中、外反动派鼓吹尊孔复古，鲁迅尖锐地指出：愚弄、压迫人民的孔孟之道，从来就是反动统治阶级手中“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中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提倡它，是为了把劳动人民“麻痺为不死不活状态”，既能俯首贴耳地“被治”，又能献出血肉来“供养治人者。”（《坟·春末闲谈》）帝国主义赞美它，是为了“灭中国”，（《集外集拾遗·报〈奇哉所谓……〉》）“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在中外反动派的软刀加钢刀的统治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甚至“下于奴隶”（《坟·灯下漫笔》）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针对反动文人的尊孔叫囂，鲁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批判。他把胡适之流的反动文人，比做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鐸”

的“山羊”，他们的任务就是“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听凭反动派的宰割。（参看《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他们宣扬“整理国故”，其结果必然使“中国永远与世隔绝”，使青年“灭亡”（《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嘲笑学衡派、甲寅派等封建复古组织，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热风·估〈学衡〉》），“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华盖集·答K S君》）！鲁迅无情揭露反动派及其帮凶鼓吹中庸之道是奴才的“卑怯”，是“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的“圣道”（《华盖集·通讯》）。鲁迅针锋相对地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斗争主张。（《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在本时期内，鲁迅除了运用杂文这一战斗武器外，还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塑造了被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活活吃掉的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等一系列典型形象，对孔孟之道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有力讨伐。

鲁迅在愤怒抨击反动派及其帮凶对于人民群众进行精神统治的罪恶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他们“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但由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因而“不能十分奏效”，“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坟·春末闲谈》）鲁迅越来越认清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的响亮号召！（《坟·灯下漫笔》）

鲁迅在这一时期，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他对现实阶级斗争的深刻了解，对孔孟之道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深刻考察，使他在反孔斗争中得出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鲁迅的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的尊孔复

古阴谋，有力地鼓舞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掀起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斗争高潮，南方的农民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发展起来。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开始了北伐战争。中国人民为了打碎身上的锁链，拿起枪杆子，大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大造孔孟之道的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迅速发展，节节胜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窃取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抗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拱手出让革命领导权，使钻进革命统一战线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乘机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血泊中建立起法西斯反动政权。“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在这困难和危急的时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政策吓破了胆。陈独秀一伙叛徒散布革命取消论，要无产阶级向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缴械投降。叛徒林彪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哀鸣，散布悲观情绪。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主席严正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论调，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响亮革命口号，英明地领导党和革命队伍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并先后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率领革命群众进行了“以工农武装割据”为特点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毛主席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将革命力量“剿尽杀绝”，使用举世未有的残酷手段，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又掀起了一股股的尊孔复古逆流，作为他们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手上血迹未干，就跑到曲阜朝圣，吹捧孔丘是“万世人伦之表”。他还不断发表尊孔反动言论，胡说“四书五经”是“永久不变的原则”，叫嚷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就是行“仁政”。一九三四年，强令推行以宣扬封建道德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和“尊孔读经”的反动教育，妄图利用孔孟之道加强法西斯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等武装侵略的同时，也拼命宣传“孔子之教”，鼓吹建立“王道乐土”，并且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在东京汤岛举行什么新建孔庙的落成典礼，大搞“孔子祭典”活动。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胡适，不仅继续吹捧孔丘，而且丧心病狂地向帝国主义强盗献策：只有鼓吹“王道”，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才能彻底征服中国。已经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托派分子，如陈独秀、李季、陈伯达之流，也配合反动派尊孔复古的喧嚣，叫嚷要“重新评定”孔丘的“价值”（陈独秀：《孔子与中国》），吹捧孔丘是“富于朝气，勇于进攻”的“新兴”阶级的代表（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大叛徒王明，竟要共产党员成为孔孟学说的“真

正继承者”！“批判资本主义工运”“群众革命革命革”，夹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一次次的尊孔复古逆流，都是配合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对反动派的尊孔叫嚣，进行了坚决回击。毛主席彻底否定了尊孔派所宣扬的“圣人”、“先哲”等谬论，从根本上批判了孔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世界观，强调了实践的重性；批判了被捧为儒学群首的董仲舒所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学说，尖锐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其作用就是要证明剥削制度“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毛主席在这些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论述，为批判孔孟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劳动人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反孔斗争的发展。

鲁迅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而更加自觉地投入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战斗实践中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严于解剖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在反“围剿”斗争中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结合当时政治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孔丘和孔孟之道以及它们的吹捧者，展开了更猛烈、更深刻的批判。

鲁迅彻底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仁政”、“王道”的反动本质，指出：所谓“王道”，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的东西。“王道”和“霸道”是反动派在不同时期内使用的反革命两手。“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

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反动派鼓吹“王道”，一方面是掩盖他们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一方面是“治民”，把人民治理得同驯服的“牛羊”一样，“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准风月谈·野兽训练法》）

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丘及其反动学说巩固自己统治的规律，提出了孔丘和孔孟之道是反动派的“敲门砖”这一光辉论断。这就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拣起这块“敲门砖”，鼓吹尊孔崇儒之日，也正是他们对抗历史潮流，大搞反革命复辟之时。他们都想利用这块“敲门砖”敲开他们梦想中的“幸福之门”，“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毫不留情地宣告了一切利用孔孟之道的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

鲁迅以丰富的反孔斗争经验，尖锐地揭露了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胡适之流蝇营狗苟、卑鄙龌龊、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指出他们“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帐》），愤怒抨击了甘做帝国主义儿皇帝的反动派和向帝国主义献征心策的胡适这些民族败类利用孔孟之道卖国投敌的罪行。

鲁迅还对托派的投敌卖国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指出他们所宣扬的包括尊孔论调在一整套反革命理论，恰恰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欢迎，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们那些“高超的理论”，必将“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鲁迅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之后，不但对儒家的批判更为深刻尖锐了，而且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

中，肯定了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华德焚书异同论》中，具体分析了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是有进步作用的，完全不同于希特勒的焚书；鲁迅还从秦始皇“博采各种的思想”和“车同轨，书同文”等重大措施，论证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这对尊儒反法的小丑们，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鲁迅在同国内外反动派长期的斗争中，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为了战斗，他不顾病体，在逝世前夕，还接连写下了《死》、《女吊》等杂文，深刻批判了孔孟之道的“恕道”、“犯而勿校”等黑货，向革命人民指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教导我们：对于敌人“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这种忘我的反孔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鲁迅最后十年的这些战斗，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侵略、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苏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鲁迅的这些战斗，直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鲁迅本人，“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孔同尊孔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坚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旧中国这一尖锐斗争的反映。鲁迅自觉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批判孔孟之道和“新兴的无产者”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猛烈抨击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反动势力，怒斥孔孟之徒的复辟阴谋；坚决支持并积极参加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热爱革命新生力量，这是贯穿在鲁迅反孔战斗历程中最鲜明的战斗特色。

今天，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仍然念念不忘“克己复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